

# “舆论干政”： 《申报》与同光之际的西征新疆举债

刘增合

**内容提要** 光绪初年，左宗棠开始统率湘军平定新疆叛乱。在此前后，英国驻华公使基于该国远东利益考虑，频频筹谋维护阿古柏政权的存在。在华英文媒介为捍卫英国利益而不断刊文，既反对左宗棠西征行动，呼吁保持新疆反叛势力独立，又干预西征借款的举动。英人创办的中文报纸《申报》紧随其后，或刊发社论，或转载英文报纸社论，刊载西人提供的虚实相间的战况消息，起到辅助和帮腔的作用。解读该报这一时期的编辑行为和办报理念，若不内窥各类牵制因素，单纯依赖该报自我表白，极易陷入隔靴搔痒的境地，所谓“文人论政”“不党不私”等定位，亦不免堕入罗生门陷阱。

**关键词** 《申报》 左宗棠 西征 外债

“士人论政”“文人论政”“知识分子论政”是近代新闻传媒研究中，学人经常使用的中性概念。具体到光绪初叶的左宗棠统军西征大业，初创时期的《申报》空前予以重视，刊载了数量较多的新闻和评论；左氏筹谋举借外款以支持西征战事，该报配发系列战事报道，更费心研撰一系列负面评论，冀能影响清廷决策。学界此前研究该问题时，“文人论政”“士人论政”“敢于直言”“不党不私”“有闻必录”之类的定位和判断表面上似可成立；<sup>[1]</sup>惟相关研究，忽略英国对新疆的觊觎和舆论安排，舍弃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因滇案而蛮横拒借英款，更撇开楚淮分野、军饷对立的格局，单纯瞩目于秀才论政一途，尚不可能完整揭出土人论政曲径通幽的底蕴，左氏愤激之下，批评该报“张西訕中”“把持国政”，<sup>[2]</sup>倒是切合时政要害。<sup>[3]</sup>《申报》主笔行为究竟是“论政”还是“干政”，甚至“乱政”，这涉及国家征讨外敌叛乱，只有深入时境深处，关联多方纠葛，方可解读这段《申报》初创时期秀才主笔干预清廷重大决策的历史实相。

## 一、英人觊觎新疆与《申报》舆论辅助

同光之际，《申报》的华人主笔或许不知，左宗棠西征前后，新疆以及疆外地

区，正处于英俄两国的“大角逐”时期，<sup>[4]</sup>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搜集新疆情报，工作之余，瞄准了中国研究西域比较有影响的祁韵士、徐松、松筠、苏尔德等人关于新疆问题的论著；<sup>[5]</sup>侵入中国新疆的阿古伯势力，成为英俄争霸的关键牵制力量。俄国猜忌阿古伯的动向，为了抵制英、阿双方结盟，1871年俄军占领伊犁。此后，俄、阿关系日趋恶化，阿古柏自恃与英结盟，拒不理睬俄国的劝诱，使俄国大为怨愤。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调集军队，力主伐阿，只是由于英国间谍策动浩罕的反俄变乱而不得不中止。<sup>[6]</sup>

防备俄国侵占新疆并威胁阿富汗和英属印度，这是英国决策的基本动机，“把喀什噶尔从中国分离出来，把阿古柏政权变为英国长久的保护国，可利用它去反对俄国，堵塞俄国的贸易和影响扩大到亚洲腹地的道路。”这是后来俄国学者窥见英国殖民心态的走势。<sup>[7]</sup>同治十三年秋季，英属印度总督向英国政府建议：“由两国（指英国和俄国——引者）政府在北京采取外交行动，可能制止中国政府进攻爱弥尔（指阿古柏——引者）；如果这种联合行动办不到，由驻北京的英国大使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国政府，那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喀什噶尔王国的独立应尽一切可能，予以推持，这点对于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极关重要。”<sup>[8]</sup>印度总督的这一主张提出后，驻华公使威妥玛实际上采纳了这一建议，随之委派其中文秘书梅辉立赶赴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会谈，提出将伊犁让予俄国，将新疆南路让予阿古伯的建议。李鸿章畏惧俄国实力强大，又担忧英国发兵威胁，然而其内心更希望截留更多饷源，以之作为淮军经费，用于东部沿海的防务建设。于是，他同意西征部队停止向阿古伯进攻，而且可以节省大量军费。<sup>[9]</sup>王绳祖教授敏锐地判断说，这是李鸿章排斥湘军、力挺淮军的计谋，放弃收回新疆主权，腾出军费支持海防，“阴谋扩大淮系军阀的势力，与湘系对抗。”<sup>[10]</sup>李鸿章随后正式向朝廷提出了放弃新疆攻剿计划的建议。<sup>[11]</sup>这些外交举动，国内舆论如何反馈呢？

《申报》华人主笔在新疆问题上有关英、俄、阿三方关系的细微变化或不甚明晰，但该报经营者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ier）与三位友人伍特华、蒋莱亚、麦基洛未必不知底细，即便其亦不甚知晓英国的外交谋划，而该报经营者与租界工部局官员、英国驻上海领事均有密切联系，或有机会受到英方官员的暗示与授意，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基于受众是华人的特殊性要求，该报在言论控制上，坚守一个底线，就是不伤害英国在华的根本利益。<sup>[12]</sup>《申报》初创时期，由于该报资讯网络较小，外埠新闻的来源，大多依靠两个途径获取：第一，各地传教士和热心读者的信函投稿；第二，转译来自西文报纸和外国通讯社的电稿等。其中，就西征和新疆问题而言，第二个途径则尤为重要。据学人研究和统计可知，《申报》转载西征和新疆问题涉及的“西报”主要有《字林西报》、英国《泰晤士报》、印度报纸、《循环日报》、美国纽约新闻、《英国日报》《晋源西报》、俄国电讯等。<sup>[13]</sup>“有闻必录”是《申报》奉行的报道原则，然而，《申报》热衷于转载这类西报新闻和评论时，

却具有相当的“选择性”倾向，关键时刻实际上执行的是“有闻可以不录”的政策（详见后）。

报纸编辑的“选择性”行为深受新闻把关人的政治倾向影响，单就西征和新疆问题而言，影响该报选择性报道因素大致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租界内部西方人的舆论和认识倾向，尤其要防止与英国在华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第二，江浙文人的地域观念和文化认知，特别要避免与开埠通商的东部沿海区域利益和地域观念相牴牾。西人注重通商利益，而英国尤其看重新疆利益，自不必赘言；《申报》编辑行为中的“选择性”报道，之所以受到江浙文人的认知影响，直接起因便是该报早期的15名华人主笔中，绝大部分是江浙两省科考功名中低层次的读书人，统计如下：<sup>[14]</sup>

表1 《申报》早期华人主笔简况表

姓名	籍贯	出身	年龄
蒋芷湘	浙江杭州	举人	似为中年
吴子让	江西南丰	曾国藩幕僚	59
钱昕伯	浙江吴兴	秀才	39
何桂笙	浙江山阴	秀才	35
蔡尔康	江苏上海	秀才	20
姚赋秋	江苏苏州	布衣	20余岁
沈毓桂	江苏震泽	无功名	近70岁
钱明略	似为浙人	未详	30余岁
沈饱山	浙江山阴	贡生	30
沈增理	江苏青浦	秀才	未详
蔡宠九	山东历城	江南制造局翻译	30
黄式权	江苏南汇	秀才	31
高太痴	江苏苏州	秀才	26
朱逢甲	江苏华亭	秀才	60余岁
韩邦庆	江苏松江	秀才	35

上述早期阶段《申报》的华人主笔和编辑人员，绝大多数属于“吴人”范围，生活地域局限于江浙一隅，虽然是读书人，但科举功名大部分居于中下层次，并不掌握权势。秀才这类群体在清代知识群体中所占比重较大，因应科考的实践，科层变动比较频繁，观念认知局限于地域社会的情况比较明显。外人在华创办《申报》这类中文报刊，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的新生事物，华人秀才、举人作为主创人员，其采稿、编辑和发稿，自然会受其既有观念认知的影响。西征行动远离东部通商口岸，新疆与上海远隔千山万水，这对于秀才主笔们来说，简直是恍若隔世之物，其立场和视野与清廷官方上层，并非高度吻合。《申报》涉疆社论的撰写和战况消息的编发行为，实可体现出疏离清廷而认同外电立场的基本倾向。转载的外电中，以沪

“舆论干政”：《申报》与同光之际的西征新疆举债

上英国人创办的《字林西报》为最多，这份办在中国的《泰晤士报》，享有英国路透社电讯的使用权，<sup>[15]</sup>紧跟英国政府的步伐，营造对华舆论，而《申报》的言论倾向基本等同于英国背景的《字林西报》，准确地说，它扮演着“帮腔”和“辅助”的角色。

进入同治十三年后，左宗棠即筹备率军平定新疆叛乱，西文报刊对新疆问题开始空前关注，从各个角度指责批评征疆计划，形成一股强劲的西方舆论，《申报》或转载外电报道，或以外电评论为基础，引申阐发其基本论调，立场上显示出“偏西”的一面。涉疆问题上“偏西”的社论和战况消息，主要体现出两个倾向，其一，反对清廷组织的征疆行动，力主保持疆内叛乱政权原封不动；其二，西征大军难以撼动疆内敌对政权的根基，且屡屡营造左军战役败退舆论。前者主要体现在涉疆社论的编发上，而后者则通过一系列战况报道体现出来。兹将其偏向西方的主要舆论报道编制简表，列示如下。

表2 同光之际《申报》涉疆评论与西征报道简表

涉疆社论	社论内容和态度倾向	西征消息报道	倾向和舆论作用
《论英国与回部通商》(1874年7月18日第1版)	英国与阿古柏政权订立商约，社论持欢迎态度。	《回疆情形》(1875年6月11日第1版)	阿古柏政权向土耳其和俄国求援，中国征叛军事行动不可能取胜。
《论喀什噶尔事》(1874年11月11日第1版)	征战不毛之地，费用浩繁，不值得；阿古柏势力强大，中国不可能战胜；建议清廷令阿政权独立于中国之外。	《西征消息》(1875年9月23日第1版)	西征军并未直捣叛军巢穴，且存在恶意焚毁城池行为，战役组织上太过稳重，未取得战功。
《书论喀什噶尔事后》(1874年11月13日第1版)	不毛之地不值得清廷耗费巨款征战；新疆回首与朝鲜、西藏、蒙古、越南等国一样，令其变为岁贡藩属国，可免疆域广大，鞭长莫及尾大不掉之虞。	《西报述甘省信息》(1876年5月12日第1-2版)	左营饷缺兵哗。
《论俄国议助喀什噶尔以抗中朝》(1875年5月3日第1版)	主张中国朝廷应该与阿古柏政权和平通商。	《甘蜀续信》(1876年5月13日第1版) <sup>[16]</sup>	阿古柏军队占领嘉峪关，甘省全省沦陷。
《译论征喀什噶尔之失》(1875年6月16日第1版) <sup>[17]</sup>	中国库储不丰，台湾生番尚不能征服，何况实力强大的阿古柏政权？	《陕甘传闻》(1876年6月1日第1-2版)	左营被阿古柏军队隔截关外，未能回师，陕西、山西、四川、湖北各省均派兵赴援。
《论征新疆》(1875年9月6日第3版)	西征部队军械落后，士气不佳，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不如放弃西征。	《西陲悉耗》(1876年6月5日第1版)	传左爵相统领大兵西征回部，近已败退，爵相亦阵亡。

续表

涉疆社论	社论内容和态度倾向	西征消息报道	倾向和舆论作用
《论征西近日情形》 (1875年12月8日 第1版) <sup>[18]</sup>	华兵并未与喀什噶尔精兵交战，征疆举措万难成功；耗费中国有用之钱粮，而征伐沙漠无益之土地，亦非计之得者。	《西陲消息》(1876年9月15日第1版)	陕西省官军于正月初旬被回匪攻击迭破阵地，阵亡者不少；阿古柏已率兵四万企图攻破嘉峪关，进犯内地。
《书中西各报霍罕复叛俄人后》(1876年4月3日第1版)	即令新疆诸城尽复，而霍罕不畏俄国，屡服屡叛，未必反畏中国，而能常服不叛，恐未必能如此尊崇中国，非中国之得计也。		
《论俄罗斯辨取霍罕》(1876年4月25日第3版)	俄对于霍罕，终必使隶版图，盖其志在覬覦新疆一带，故得尺则俄之尺，得寸则俄之寸也。		
《论西报述喀什噶尔事》(1876年9月12日第1版)	喀什噶尔毗连霍罕，其风气大约相同，中国岂易征服耶？		

由上述列表的举证来看，《申报》在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光绪二年这三年中，在舆论营造方面，扮演的是紧跟英国媒体的“辅助者”角色，如果抛开该报在社会生活报道方面不偏不倚的立场，单就西征和新疆问题而言，这份较早的中文报纸，与沪上其他英文报刊立场相近，而所起的作用却远超外媒。总体上看，《申报》实际上保持着与李鸿章淮系势力较为接近，而与清廷内部主战派相对疏离的立场。接下来更为关键的外款举借问题，该报在“近李疏左”方面的倾向则更为明朗了。

## 二、拒借舆论经营和英方外交讹诈

西征大规模举借外款的筹划，同治十三年即已开始。举借洋款，左宗棠专门委托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落实，胡氏做事深受左宗棠的信任。<sup>[19]</sup>光绪元年十月时，各省欠解西征军饷高达2740万两，借着奏报西饷来源枯竭实情，左氏郑重提出大规模举借外款的请求，基本方案是仿照去年沈葆楨筹借洋款办理台湾防务的做法，举借外款1000万两，并建议朝廷委托沈葆楨代为办理借款事宜。<sup>[20]</sup>

左氏之所以委托沈葆楨筹划外款举借，左、沈两人的交谊融洽是重要的条件。同治六年，经左宗棠保荐，沈氏担任福建船政大臣。船政局经费严重匮乏，左宗棠的西饷本不充裕，却毅然从西征饷项内，挪出款项，支援船政建设。<sup>[21]</sup>沈葆楨十分感激，此事左氏后来亦曾屡屡谈及，“弟于从前幼丹船政告匮时，举闽协的饷二十六万畀之，宁忍饥分食，以船政无事权，而陕甘尚握兵符耳。其时幼丹复函，亦谓使督抚均能如此，何事不办？”<sup>[22]</sup>此后，沈葆楨对西征饷需的供应十分关注，屡屡与人

谈及积极支持西征经费的态度，“垂老穷边，独为其难，吾辈非万分无可奈何，敢度外置之？”“季老以垂暮之年，独为其难于万里外，吾辈可以为力之处，不为尽力，夫岂为人情？”<sup>[23]</sup>可见左、沈关系之密切。然而，《申报》对西征借款的消极性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沈葆楨的决断，也影响了福建巡抚丁日昌对左氏举借外款的态度，两者均从《申报》社论中寻求反对左氏借款的基本依据，这一举动，实际上配合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对华拒借英款的外交方针。揆诸当日各方表态，在左宗棠筹借征疆外款问题上，中外势力形成了“英使威妥玛——英文报刊——《申报》——沈葆楨——丁日昌——李鸿章”这一或明或暗的阻借阵营结构，英文媒介的阻借态度自不必说，这一结构中的《申报》最值得注意，它作为中介，既传递了西方媒介的态度，又配合着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外交行动，其拒借舆论更对沈葆楨、丁日昌、李鸿章等封疆要员产生直接影响。

在此前后，《申报》主笔有选择地撰写社论，或转载有倾向性的社论，意在阻止西征借款，较为重要者如下简表所列。

表3 《申报》同光之际阻止举借外款的社论简表

社论及刊期	基本主张	备注
《论告贷》(1874年11月30日第1版)	英国举借外债，但国民致富，未成负担；中国若因战争举借外款，积成大债，而不兼行振兴民间正经事业，未免为后日之累。中国应节省岁用，不轻用于边外，尤不能用于西北战事。	
《译论中国告贷事》(1875年1月23日第1版)	如果举借外款用于开矿等生利事业，值得支持；但清廷此次借款或许是为台防事业，则不赞成，因其与生利富国无关。	<i>The N.-C. Daily News</i> , Thursday, January 14, 1875, p. 38. (Chi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Loan 此条消息从1月11日至1月16日在相同板块出现)《申报》据此引申评论。
《译字林新报论中华新行告贷一事》(1875年3月15日第1版)	土耳其因告贷而不堪重负；目前中国国穷民困，缺少生利事业，官方不能正确理解西方富强改革的底蕴，因而反对单纯举借外款。	<i>The N.-C. Daily News</i> , Saturday, March 13, 1875, p. 231.
《论新报言土耳其国事》(1875年8月9日第1版)	土耳其仅恃每年告贷积债，临近亡国；中国富强，推荐李鸿章的富强谋划，加强理财，反对因战事举借外款。	<i>The N.-C. Daily News</i> , Tuesday, August 3, 1875, p. 115; <i>The N.-C. Daily News</i> , Friday, March 12, 1875, p. 227. 《申报》据此报道，并加以引申评论。
《续述土国负债》(此为消息)(1875年12月14日第1-2版)	土耳其亏欠英国巨额外款高达300余兆，英国债权人无不愤怒；埃及亦向英人告贷，为数甚大，而国库支绌，恐亦难抵此重利也。	<i>The N.-C. Daily News</i> , Tuesday, December 7, 1875, p. 547.

续表

社论及刊期	基本主张	备注
《论借饷征回事》 (1876年3月3日第1版)	新疆劳师糜饷不胜计数，实为中国之累。以有用之财取其不毛之地，已属失算，一千万银尚不能敷，又将何法以善其后？今又借西国银两以征服之，即使攻克全疆，大军一退，彼又反复。为今之计，莫若将新疆已克之地慎固封守，待国力强大再作计较。	
《书贷银续闻后》 (1876年3月15日第1版)	左伯相自前岁用兵关外，至今所用兵饷将及千万两，兹再借一千万两，即能竣事，则所费已将与二千万两。此次收复新疆用银已将三千万两之多，而前之所费与后之所费尚难数计，则中国受新疆之累亦难言。	<i>The N.-C. Daily News</i> , Monday, March 13, 1876, p. 235. 《申报》据此引申评论。
《再论借贷征回事》 (1876年3月27日第1版)	中国收回新疆后非竭关内各省之财力不足以守，其耗费定非前代所能及；不如与欧洲各国商议，在各回部中择定国君，可为中国之藩篱，不费中国之财力，否则岂长久之计乎？即借贷之事亦非可以履行者也。	香港《循环日报》和《中外新报》发表支持举借外款社论，《申报》社论反驳。
《辨字林新报所言喀什入关事》 (1876年5月2日第1版)	左帅于去年借用西国之债一千万两之后，复欲借贷西国之债二千万两，英国诸人不以为然，今岁汇丰洋行亦难再允借贷。	<i>The N.-C. Daily News</i> , Saturday, April 29, 1876, p. 395; <i>The N.-C. Daily News</i> , Wednesday, April 26, 1876, p. 383.
《译西报论告贷制造事》 (1876年5月12日第2版)	西人自土耳其亏欠巨款后，对贷银一事颇自留神，若既无利息，而国又空虚，只有辞谢。今中国为征喀什，筹此巨款，实属无益有损之举，即幸而得胜，仍须以重兵驻守，粮饷器械有去无来，何能再归欠款耶？	<i>The N.-C. Daily News</i> , Thursday, May 11, 1876, p. 435.

光绪二年前半年，是左宗棠运筹举借外款的关键岁月。这期间，《申报》为阻止西征借款而转载和撰写的社论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就在清廷做出关键决策的前夕，该报在同一月份连续转载和撰写3篇社论试图阻止借款行动，<sup>[24]</sup>其间甚至编造和传播谣言，该报通过转载外电消息，散布朝廷举借外债数额高达2000万两，担忧平定新疆叛乱之役将会拖垮中国财政，“此次收复新疆用银已将三千万两之多，而前之所费与后之所费尚难数计，则中国受新疆之累亦难言……中国自古及今，边饷之耗费莫过于今日之新疆也。”<sup>[25]</sup>次日，报馆又专门刊文，声称清廷即将举借西方的外债竟高达3000万两，惊呼“夫三千万为数甚大，若仅为供兵之空用，则积息所贻累者未免为之一虑！”<sup>[26]</sup>通过营造阻借舆论，冀能最大限度影响清廷的决断。

而且，经笔者仔细检索审读《申报》这段时间的社论刊登记录，发现该报此前经常转载香港《循环日报》《中外新报》等媒体社论，而对这两份报纸支持西征借款的重要社论却未加转载，故意“视而不见”，其态度和立场的选择性倾向更为明显。这说明，该报所谓“有闻必录”的方针并未落实，实际上贯彻的是“有闻可以不录”。光绪二年春季，《循环日报》刊文认为，左宗棠筹划大规模举借外款以支持西征大业，必有成竹在胸的获胜信心，非局外人所能得知，而某些报刊舆论反而瞻前顾后，反对举债，该文作者十分不解。大约相同时间，《中外新报》刊文认为，新疆今昔情形完全不同，在古代，它与蒙古仅仅是中国的藩篱，目前则为亚欧两洲之门户，中国一旦弃之，则欧洲各国必群起而争之，如被欧洲各国所得，则中国在亚洲并无门户可言，因此，中国万不可弃置不管。这种倾向正好与《申报》的立场相左，因而该报不但不予转载，而且专门由主笔针对香港这两篇社论的观点进行撰文批驳，提出“新疆之地如此难于处理，不如与欧洲各国商议，中国与欧洲各国均不必据有其地，于各回部中择定最为驯良为回人所共服者，立之为君，以为亚、欧两洲枢纽之国，使为两洲不侵不叛之臣，如春秋时间于晋楚之郑，庶几可为中国之藩篱，不费中国之财力，又不至为欧洲各国所夺取，否则中国自行守边于数万里沙漠之外，直欲驾秦皇而上之，岂长久之计乎？即借贷之事亦非可以屡行者也。”<sup>[27]</sup>

《申报》屡屡刊文反对之外，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其实是阻借外款阵营中最强势的一方，他代表英国政府公开阻挠中国的借款行动。光绪二年三月初一日，清廷发布准许左宗棠举借外款500万两的上谕。<sup>[28]</sup>该上谕发布前数日，总署接到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正式照会，询问中国是否在酝酿举借外款，是否已经得到上谕允准，借款章程是否定妥；<sup>[29]</sup>谕旨即将下达的前一天，威妥玛又强硬地照会总署，在云南马嘉理事件未妥善处理之前，他已经告知该国商民，不准向中国贷款。<sup>[30]</sup>这些照会，是威妥玛为解决马嘉理事件而掀起的外交讹诈和战争叫嚣的一部分，在实际利益上，也符合英方对新疆的一贯政策。<sup>[31]</sup>威妥玛这一突然干预，上谕措辞中不得不飭令左宗棠：“洋款如何筹借，著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sup>[32]</sup>这显然堵塞了西征借款在英国公司范围内的运作，总署六百里加急致函左宗棠，叮嘱其应对这一突发情况。<sup>[33]</sup>也由于威妥玛的阻借行动，沪上英国商人和公司，包括积极运作借款的英国丽如银行和汇丰银行，对威妥玛十分不满，<sup>[34]</sup>这种不满，在威妥玛启程回国后，才得以宣泄出来。<sup>[35]</sup>这也从另外一面证实《申报》社论渲染的英商不愿出借巨资给中国乃不实之言。

### 三、舆论干政对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朝政决策角度来看，《申报》的舆论干政，主要体现在同光之际西征新疆战略得失取舍判断和光绪初年举借外款的两项重大决策方面。

同治十三年开始，《申报》涉疆社论频频出笼，公开传播放弃征疆行动的主张。这些舆论倾向，至少与旨在维护淮系势力的李鸿章的意图不谋而合。该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

的两篇社论刊出后，<sup>[36]</sup>因恰逢各省督抚正在研讨海防与塞防的均衡调处问题，对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鲍源深、刑部尚书崇实等督抚大员的弃疆主张影响甚大，过往论者已有泛论，惟未作深入的比勘实证分析，此处逐一对照参与决策的弃疆派大员的言论观点如何参照了《申报》两篇社论的基本论调，由此可见该报社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朝政。

表4 弃疆派高官主张与《申报》社论观点对照简表

部臣与疆吏	奏疏措辞	2篇社论观点	
		《论喀什噶尔事》	《书论喀什噶尔事后》
崇实	<p>近闻南八城回酋亦与土耳其暗中勾结，我军甚单，敌势已固，即不惜添兵益饷，恐亦难收扫荡之功；纵能暂时收复，亦不过仍照往年成例，岁耗中原三百余万金。</p> <p>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p> <p>若坐耗千万有用之财，收此丝毫无益之地，元气愈亏，腋及数省，万一海疆有事，兼顾尤难，而失机宜，何以自守？欲储东南之余力，当塞西北之漏卮。<sup>[37]</sup></p>	<p>该回酋现已结约俄罗斯国，祈俄国命师援救。且该回部所用枪炮及军器等物，均系购买于泰西各国者，故西人皆为中国虑，恐难取胜。即令无俄人之救援已忧难敌，况俄人之援否，尚在未可必之数哉。</p> <p>无论以不毛之地而置吏戍兵，即岁费亦不止百万，俾中国有限之财，供新疆无穷之费，岂计之得哉！</p> <p>克复之后，仍然岁费帑银，何益于国？又况狼子野心，岂能驯化关内之回人？</p>	<p>欲复新疆，即令指日可复，而目前用兵之费及日后守土之资，已至不可胜计，况尚未必即能克复乎！以不毛之地与难化之人，耗费重帑以取之，恐非计之得者也。</p>
李鸿章	<p>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p> <p>其地北邻俄罗斯，西属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部，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强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p> <p>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p> <p>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sup>[38]</sup></p>	<p>本朝新疆之回人，至乾隆时戡定之后，始隶入中国之版图。以不毛之地而置吏戍兵，即岁费亦不止百万，俾中国有限之财，供新疆无穷之费，岂计之得哉！</p> <p>回酋现已结约俄罗斯国，祈俄国命师援救。该回部所用枪炮及军器等物，均系购买于泰西各国，关内兵勇越戈壁而征回回，且枪炮皆用中国旧制之物，恐难取胜。</p> <p>何妨以前朝之待安南、本朝之待蒙古者待之。戈壁以内仍为郡县，戈壁以外，令为藩服，岁可减不资之费，亦可免无尽之忧。虽非中国之版图，仍为中国之属国也。</p>	<p>今欲复新疆，即令指日可复，而目前用兵之费及日后守土之资，已至不可胜计，况尚未必即能克复乎！以不毛之地与难化之人，耗费重帑以取之，恐非计之得者也。</p> <p>若使戈壁以外新疆之地几及万里，分封数十回酋，如周制至大之国，不过百里地，必能不侵不叛，岁时来朝，不过少锡饩予，以后中国可省无穷之费，较之强令隶入版图，必更易于驾驭，岂非计之得哉！</p> <p>新疆回酋必能与东之朝鲜、西之两藏、北之蒙古、南之越南等国，同为奉正朔、进岁贡之藩臣矣。</p>

续表

部臣与疆吏	奏疏措辞	2篇社论观点	
		《论喀什噶尔事》	《书论喀什噶尔事后》
鲍源深	<p>边地荒遐，回情狡谲，恐非剋日成功之举。设迁延岁月，边外之征输未已，内地之罗掘先穷。</p> <p>内地心腹也，边陲四肢也，耗费于边陲，竭财于内地，何以异是！</p> <p>于边陲小丑暂示羁縻，于内地封疆先培元气。</p> <p>请飭下西征各军，未出关者暂缓出关，已出关者暂缓前进。数年后，内地财力充裕，再出征伐叛。<sup>[39]</sup></p>	<p>狼子野心岂能驯化，关内之回人，尚且不时蠢动。</p> <p>以不毛之地而置吏戍兵，即岁费亦不止百万，俾中国有限之财，供新疆无穷之费，岂计之得哉！</p> <p>今即八城尽行克复，何妨以前朝之待安南、本朝之待蒙古者待之。戈壁以内仍为郡县，戈壁以外，令为藩服，岁可减不资之费，亦可免无尽之忧。虽非中国之版图，仍为中国之属国也。</p>	<p>今时回人机械变诈，更胜于昔。</p> <p>欲复新疆，即令指日可复，而目前用兵之费及日后守土之资，已至不可胜计。以不毛之地与难化之人，耗费重帑以取之，恐非计之得者也。</p> <p>新疆回首必能与东之朝鲜、西之两藏、北之蒙古、南之越南等国，同为奉正朔、进岁贡之藩臣矣。</p>

比勘上表提供的两端信息，基本可以证实，崇实、李鸿章、鲍源深三位参与决策的督抚和部臣，在奏疏信息来源、观点模仿和逻辑借鉴方面，《申报》社论（包括该报关于西北战况的负面报道）明显具有向导性和启发性，李鸿章奏疏中干脆称，自己是屡屡参考“外国新闻纸”和“西路探报”，这显然包括为《申报》提供社论、战况消息的《字林西报》《晋源西报》等英文报纸，由此推知，中文报纸《申报》起到了展转中介的作用，它将英方背景的各类英文媒体与清廷大员的决策行为、决策方向联结起来，旨在影响朝政决策走势。李鸿章等人的“弃疆”主张，在当时官场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醇亲王奕环也积极支持李氏“弃疆”的观点，<sup>[40]</sup>在牵制清廷事关“弃疆”与“保疆”战略决策层面，当不可小觑。

光绪元年十月左宗棠奏请的西征借款是其历次借款中额度最大的一次，奏疏上达天听后，在枢臣廷议和疆臣议复阶段，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其中，《申报》阻挠性舆论的牵制和影响，在各类制约因素中，相当明显。

左折奏上，谕旨令总理衙门和户部协商答复。光绪二年正月初五左右，两衙门研究后，建议准予举借，令沈葆楨即照该督所请，妥速筹办，以期无误事机。<sup>[41]</sup>正月初七日开始，沈葆楨和丁日昌分别接到了清廷飭令迅速研究大额度举借外款的上谕，两人先后开始研究准否举借问题。<sup>[42]</sup>从沈、丁二人上奏的时间看，这个过程大约介于光绪二年正月初七日至二月十五日（即公历1876年2月1日至3月10日），《申报》有关清廷举借外款的社论，自同治十三年以后开始增多，大多转载外报，或依据英文报纸加以引申评论，阻止借款成为其舆论主流，此类舆论对沈、丁二人决策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此处将该报关键社论与沈、丁二人的阻借奏疏逐一比勘，<sup>[43]</sup>以显示该报社论对决策者的实际影响程度。

表 5 《申报》社论与沈葆楨、丁日昌奏疏言辞对照表

奏疏	奏疏措辞	《申报》社论内容及其倾向	备注
沈葆楨 《筹议 出关铸 需碍洋 借用洋 款折》	伏惟国债之说，通行于西洋，而西洋各国受利受病，相去悬绝，则以举债之故不同，而所举之债亦不同也。 夫开矿、道路、挖河，巨费也，而西洋各国不惜称贷以应之者，盖刻期集事，课税出焉，本息之外，尚有奇赢，所谓以轻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国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 以国用难支，姑为腾挪之计，此后息无所出，且将借本银以还息银，岁额所入尽付漏卮，目下如西班牙、土耳其，皆将以债倾国，日本亦亦蹶蹶乎蹈其覆辙矣。此举债之故之不同也。 新疆广袤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所能就绪。	欧洲各国，如英、俄、法、奥各国，均负相当债款，但英国等注重贸易、开设铁路等，国与民并未因此致富。 中国如果构兵无利之事，迫于告贷，积成巨债，而不兼行振兴民间各正经济，未免为后日之累，故愿中国不以为现银之易得而轻用于边外。 不知一国不举工程类之善举，可以藉之生银，则积债必至有受累。 若中国从今以后，亦能如西国诸法，办就一切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诸善举，即有国债，不但可以岁山利银，并且可以渐还本银矣。 土耳其国告贷出息，每经一次渐昂一次，因此息银今加至殊大，故知者曰：“土国之告借已充矣，盖重息何以堪乎！” 土国惟从事于增兵额、购精器，防务之巨费者，仍然不之愿也，以致国事仅恃每年告贷以弥缝支持，积债既年多一年，而破裂之日故亦年见近一年也。 土耳其负债累累，将欠英国之项赖去一半。兹闻土国所告贷者，除别国外，专计英吉利一国，共有一百七十五兆金线，被赖一半，则英人吃亏已在八十八兆左右，合之银数有三百兆兆矣。是以英之财主受此折阅，无不怒望；更可虑者，所许之一半，恐亦成画饼也。 埃及亦向英人告贷，为数甚大，而国课颇形支绌，恐亦难抵此重利也。	《论告贷》1874年11月30日第1版 《译论中国告贷事》1875年1月23日第1版 《译字林新报论中华新行告贷一事》1875年3月15日第1版 The N.-C. Daily News, Saturday, March 13, 1875, p. 231. 《论新报言土耳其国事》1875年8月9日第1版 The N.-C. Daily News, Tuesday, August 3, 1875, p. 115; The N.-C. Daily News, Friday, March 12, 1875, p. 227. 《续述土国负债》1875年12月14日第1-2版 The N.-C. Daily News, Tuesday, December 7, 1875, p. 547.

续表

奏疏	奏疏措辞	《申报》社论内容及其倾向	备注
<p>沈葆楨 《籌議 出關餉 需碍難 借用洋 款折》</p>	<p>今以一千萬照台 灣成案，八厘起息，十 年清還，計之耗息約 近六百萬，不几虛擲 一年之餉乎？若照此 數乘除，則西征僅得 四百萬實餉耳。漕 可立待，進兵愈遠，轉 運愈難，需餉亦愈巨， 將半途而廢乎？勢必 不可，將各省于還債 之外另籌解濟乎？勢 又不能。將再借洋款 乎？海關更無坐扣之 責，呼之不应。</p>	<p>新疆回部各城，勞師糜餉不勝計數。即使安靜無事，而設官養兵之費，亦 將及百萬，實无毫末有益于中國之處，徒足為中國之累。 傳稅業已奏請飭令兩江總督沈制軍向西商借貸銀一千万兩，以供西征之資； 西商現均不願，設法力辭，其故由于土耳其一國借用西商之銀數千万磅，无力歸 償西國，朝廷又不能代為設法索取，其餘尚有數小國亦復如此，是以不願再將銀 兩借與他國。 沈制軍之意，亦以為海關稅項所用甚廣，即江南一省亦賴之，所有防海諸事 均在此項取用，今一旦令抵借款，則諸項久將何籌？是以亦不願為此舉。 此次收復新疆用銀已將三千万兩之多，而前之所費与后之所費尚難數計，則 中國受新疆之累亦難言。</p>	<p>《論借餉征回事》1876年3月3日第 1版</p>
		<p>此次收復新疆用銀已將三千万兩之多，而前之所費与后之所費尚難數計，則 中國受新疆之累亦難言。</p>	<p>《書貨銀續開后》1876年3月15日 第1版 The N.-C. Daily News, Monday, March 13, 1876, p. 235.</p>
		<p>中國取之尚易而守之實難，非竭關內各省之財力不足以守新疆万余里之上 地，其耗費定非前代仅仅取關外各國所能及，若使規畫盡善，將新疆各城所屬之地 興利除弊，足以支持歲用。</p>	<p>《再論借餉征回事》1876年3月27 日第1版</p>

续表

奏疏	奏疏措辞	《申報》社论内容及其倾向	备注
<p>丁日昌为西 《奏解西 事不宜 多借洋 款事》</p>	<p>以一千两分十 年计之，除还本银一 千两之外，须添出 利银一千万两，合之 前借五百两，计每 年须贴洋人息银一 五十余万两。国家 经费有常，岂能骤 增此意外巨款？ 泰西土耳其、波 斯等国皆因公债过 重，以致利权全为他 国所执持，国势因以 削弱，前车之鉴，可为 寒心。</p>	<p>土耳其国告贷出息，每经一次渐昂一次，因此息银今加至殊大，故知者曰土国之告借已完矣，盖重息何以堪乎！</p> <p>土国惟从事于增兵额、购精器、防务之巨费者，仍然不之愿也，以致国事依恃每年告贷，以弥缝支持，积债既年多一年，而破裂之日故亦年见近一年也。</p> <p>土耳其国负债累累，将欠英国之项去一半，兹闻土国所告贷者，除别国外，专计英吉利一国，共有一百七十五兆金钱，被赖一半，则英人吃亏已在八十八兆左右，合之银数有三百余兆矣。是以英之财主受此折阅，无不失望；更可虑者，所许之一半，恐亦成画饼也。 埃及亦向英人告贷，为款甚大，而国课颇形支绌，恐亦难抵此重利也。</p> <p>此次收复新疆用银已得三千万两之多，而前之所费与后之所费尚难数计，则中国受新疆之累亦难言。</p>	<p>《译字林新报论中华新行告贷一事》 1875年3月15日第1版 The N.-C. Daily News, Saturday, March 13, 1875, p. 231.</p> <p>《论新报言土耳其国事》1875年8月9日第1版 The N.-C. Daily News, Tuesday, August 3, 1875, p. 115; The N.-C. Daily News, Friday, March 12, 1875, p. 227.</p> <p>《续述土国负债》1875年12月14日第1-2版 The N.-C. Daily News, Tuesday, December 7, 1875, p. 547.</p> <p>《书贷银续闻后》1876年3月15日第1版 The N.-C. Daily News, Monday, March 13, 1876, p. 235.</p>

细密阅读沈、丁二人奏疏后，可以明显体会到，其反驳左宗棠举借外款的理由，最具威慑力的算是举证土耳其、埃及、波斯等国家因举借外款而几乎亡国的事实，这一点对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廷而言，其说服力之大，不言而喻；西征新疆的巨大耗费，地广人稀而不具财富价值这一严峻现实，也意味着新疆将会变成清廷难舍难弃的“销金锅子”，<sup>[44]</sup>必将会对全国财政造成严重的拖累，联系到同治十年以来的三年中，各省军需耗费已高达6000余万两，<sup>[45]</sup>各海关、各省藩库均面临捉襟见肘之窘困现实，而且户部库藏极为匮乏，部臣屡屡反对内务府随意侵夺部库存储的窘迫局面，<sup>[46]</sup>管部大臣阎敬铭事后也针对清廷新疆财政调处的难度感慨万千，<sup>[47]</sup>由此看来，《申报》所谓新疆将会严重拖累内地各省这一理由也具有明显的冲击力。这些理由，《申报》刊发的社论以及此前发表各类战况报道屡有刊载，为沈、丁二人起草奏疏提供了足够的“养料”，舆论干政这一称谓，谁曰不宜？左宗棠屡屡侦知该报所谓的西事报道和莠言乱政，尤对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等东部大员动辄搜罗报纸言论，据以入告内廷的行为，十分愤慨，他的怒气不得不指向两个方面，其一是“东部诸侯”的误听误信，其二是《申报》这类新闻纸的莠言乱政：

某公乡评不高，于海国情实素本无所闻见，乃竞侈口而谈。当事录以入告，盖欲笼沿海之饷养洋枪队耳。朝廷以两江总督授刘，颇非其心所乐，恐利权不属，不能长养此不战之兵，实则蠹国已久，未曾收一割之效。<sup>[48]</sup>

洋事坏于主持大计者，自诩洞悉夷情，揣其由来，或误于新闻纸耳。此等谬悠之谈，原可闭目不理，无如俗士惟怪欲闻，辄先入为主。<sup>[49]</sup>

吴越人善著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新闻纸，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sup>[50]</sup>

《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复问。合肥据以入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sup>[51]</sup>

《申报》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资之以给中国，其中亦间有一、二事迹堪以覆按者，然干涉时政，拉杂褒语，附录《邸报》，无纸不然。纤人之谈，不加究诘，置之不论足矣。合肥竟以入奏，并议撤西防以裕东饷，何耶？<sup>[52]</sup>

沪局新闻纸公然把持国政，颠倒是非，举世靡靡，莫悟其奸，而当事者不但不加诃禁，又从而信之，甚且举以入告，成何事体！可为浩叹。<sup>[53]</sup>

左氏上述私函对象虽有不同，但其剑锋基本指向两个方面，“某公”“当事者”“主持大计者”“洞悉洋务者”，甚至“合肥”这类直接称谓，均涵括与海防有密切关系的京官和外臣，而“东饷”与“西饷”这类相互对立的用词，明显体现出淮军与楚军在军饷利益上格格不入，更反映出海防需款与西征军费的严重抵牾；“新闻纸”《申报》“沪局新闻纸”之类的指代或称谓，又将《申报》推到了湘淮矛盾和朝政纠葛的前沿，函中“干涉时政，拉杂褒语”“把持国政，颠倒是非”，虽未将该报西征舆论的性质和定位全盘托出，但亦断定其处心积虑，意在进行舆论干政的企图。

若探究文人论政，媒介干政之类，研究者或瞩目于民国初年的“党派媒体”，或关注民国时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独立评论》《努力》周报之类，间或也有以《申报》早期“文人参政”为观测对象的，<sup>[54]</sup>揆诸其论，正面肯定者居于多数，几乎成为一种定论。然而，调整视野，关联时政，勾稽舆论背后的各类驱动因素后，在左宗棠西征新疆举债问题上，东部各路诸侯的财政利益和《申报》论政现象倒值得再三琢磨。淮系势力渗入东部省份，其军饷供给、在地利益更不可忽视；而《申报》文人视野和报道理念既受限于租界西人的价值取向，又囿于地域观念，其挟洋阔论，虽自嘲系“齐东之语”<sup>[55]</sup>“越俎代谋”，<sup>[56]</sup>但却恰好提供了淮系督抚大员暗中抵御左宗棠西征的思想资源，大吏俯拾其“牙慧”，冀以影响清廷枢臣决断。两者客观上的不期而遇，反而形成一种牵制清廷决断西征取舍的“论政同盟”，如果再加上光绪初叶牵制西征借款的“家鬼”与“家神”彼此结缘，互为支援，同光之际的时政机缘更为复杂。今人如不内窥其中的纠葛牵连，单向度依赖媒体自我暴白，或许会堕入史学研究中的罗生门陷阱。

本文受暨南大学“远航”计划和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作者：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注释

- [1] 丁伟：《〈申报〉左宗棠西征新疆报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4年，第23、26-27页。卢宁：《早期〈申报〉新闻传播策略初探》，《编辑之友》2013年第4期，第114-115页。
- [2] 《与刘克庵》《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9-50、71页。
- [3] 涂鸣华：《重新认识早期新闻人的地位：姚公鹤的“江浙无赖文人”说辨析》，《新闻春秋》2013年第3期。卢宁：《早期〈申报〉与晚清政府：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章，上述两文相关论述分析具有相当深度。
- [4] 据贾建飞研究，“大角逐”的范围，南边到克什米尔与阿富汗，北侧至锡尔河河谷，东面可达中国新疆，西边可及布哈拉，其中，双方争夺的焦点则是阿富汗、河中地区 and 新疆。参见贾建飞：《殖民背景下的西方国家之新疆研究——以19世纪的英国为中心》，《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7-298页。
- [5] Herbert Allen Giles, *A Catalog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 [6] 王翔：《试论左宗棠西征中的外交斗争》，《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 [7] [苏] B. U.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016页。
- [8] 讷茨布罗克致索尔兹伯里，第61号，密件，1874年10月2日，英国印度部档案，第38卷，引文见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0页。
- [9] 威妥玛致德比，1876年7月8日，附件第1号，威妥玛致福西特，1876年4月6日，F. O. 17/825。此转见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 [10] 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 [11] 《筹议海防折（附议复条陈）》，《李鸿章全集》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0-167页。
- [12]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3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0-61页。
- [13] 丁伟：《〈申报〉左宗棠西征新疆报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4年，第1页。
- [14]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3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102页。此处转引，文字方面略有修改。
- [15] 陈嘉：《上海近代西文报刊掠影——从上海图书馆藏西文报纸〈字林西报〉说开去》，《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6期。
- [16] 此报道据 *The N.-C. Daily News*, Friday, May 12, 1876, p. 439 意译。
- [17] 此社论据 *The N.-C. Daily News*, Tuesday, June 15, 1875, p. 547 报道引申。
- [18] 此社论所据西文报道包括 *The N.-C. Daily News*, Tuesday, December 7, 1875, p. 547, *The N.-C. Daily News*, Monday, December 6, 1875, p. 543 等。
- [19] 《左宗棠致史致澍函》，《左宗棠致史致澍函稿》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图书馆特藏，甲289，无页码；陈乃乾：《胡雪岩与左宗棠》，《子曰丛刊》1948年第2期。
- [20] 《筹借洋款恳照台防办法片》，《左宗棠全集》第6册，第343-344页；此片内容与大致与户部、总理衙门所述基本一致，但文段与措辞稍有区别，此处斟酌参考《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征出关饷源涸竭拟请各省速解协饷与拟借洋款抄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户87，无页码。
- [21] 沈其新：《左宗棠“西征借款”试析》，《兰州学刊》1986年第6期，第67页。
- [22] 《答谭文卿》，《左宗棠全集》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28页。
- [23] 《复梅中丞》《致任筱元》，《沈文肃公牍》（一），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6、300页。
- [24] 清廷做出准借上谕是光绪二年三月初一日，这里指的是该报于此一个月刊登的3篇社论，即《论借饷征回事》（1876年3月3日，第1版），《书贷银续闻后》（13月15日，第1版），《再论借贷征回事》（3月27日，第1版）。
- [25] 《书贷银续闻后》，《申报》1876年3月15日，第1版。
- [26] 《告贷西银续闻》，《申报》1876年3月16日，第3版。
- [27] 《再论借贷征回事》，《申报》1876年3月27日，第1版。
- [28]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7卷，《清实录》第5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00-402页。
- [29] 威妥玛：《请将中国欲借款项之议曾否奉旨允准及筹借章程本属如何之处查照示知》，张德泽：《清季各国照会目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0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5页。
- [30] 威妥玛：《知照滇案未经妥结之前英商民不能助行中国筹借款项之事》，张德泽：《清季各国照会目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0号，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5页。

- [31] Cooley, James C, *T. 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 - 1882*, Leiden: E. J. Brill, 1981, pp. 120 - 122. 威妥玛在解决这一事件中, 强硬地表示: “在最后两周, 我一次次威胁, 除非我能为过去的事件取得一份适当的赔款以及确保接下来的时间里关系更友好, 否则我将撤销领事馆, 或者向中国政府采取最极端的压迫手段。”事后, 他曾冷静检讨自己的蛮横态度说: “在谈判中我很容易动怒, 我很遗憾我频繁的索要, 我坦白承认在上一次的谈判中, 我比平常更加没耐心, 同时也比平时有更多不耐心的借口。”(见该书第 122, 127 页) 关于对华战争舆论的发动, 参见陈霞飞主编: 《中国海关秘档》第 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年, 第 306、308 页。
- [32]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 27 卷, 《清实录》第 52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401 页。
- [33] 《答刘克庵》, 《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年, 第 17 - 18 页。
- [34] 据胡光墉致函左宗棠透露, 苏、沪、浙省等地英商因威妥玛掀起中英纠纷, 丝茶贸易大受影响, 纷纷哭诉威妥玛贻害匪浅; 丽如、怡和在鼓动承借巨款时, 更向胡光墉透露威妥玛拒借英款的细节, 系中国官员怂恿威妥玛所致, 赫德更是嘲讽威妥玛吃亏在于受人怂恿。参见《与刘克庵》《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谭文卿》《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年, 第 127、132、153 - 154 页。
- [35] Cooley, James C, *T. 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 - 1882*, p. 129.
- [36] 这里指的是《论喀什噶尔事》, 1874 年 11 月 11 日第 1 版和《书论喀什噶尔事后》, 1874 年 11 月 13 日第 1 版。该报尚有其他事关新疆和西征的消息, 对决策层起草奏疏提供了较多的信息资源, 此处及下面不拟展论。
- [37] 崇实: 《奏为西征宜缓筹款国用以备海防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副奏折, 档号 03 - 6006 - 008。
- [38] 《筹议海防折》, 《李鸿章全集》第 6 册,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第 160 - 167 页。
- [39] 鲍源深: 《边饷艰难请变通办理疏》, 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 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 第 841 - 850 号,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2 年, 第 1985 - 1991 页。
- [40] 朱采著: 《清芬阁集》,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 第 273 号,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8 年, 第 320 页。黄彭年著: 《陶楼文钞、杂著》,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 第 356 号,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9 年, 第 910 页。《代李伯相筹议海防事宜疏》, 薛福成著: 《庸菴文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 第 943 号,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 年, 第 109 - 126 页。醇亲王减西益东主张, 参见《复丁雨生中丞》, 《李鸿章全集》第 31 册, 第 252 页等。
- [41] 《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征出关饷源涸竭拟请各省速解协饷与拟借洋款抄折》刻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 户 87, 无页码。该件所拟标题不妥, 应该是户部、总署衙门的议奏折。另外, 此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抄档内容基本相同, 个别字词稍有区别, 参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硕恭亲王臣奕·等奏为遵旨速议具奏事》, 《题本·俸饷》(18),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特藏抄档, 第 203 - 209 页;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为筹解西饷不宜多借洋款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副, 档号 03 - 9527 - 022。
- [42]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 25 卷, 《清实录》第 52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373 -

374 页。

- [43] 沈葆楨：《筹议出关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折》，《沈文肃公（葆楨）政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 54 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1113 - 1122 页。丁日昌：《变通西饷办法疏》，《丁日昌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10 页。《奏为筹解西饷不宜多借洋款事》，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 - 9527 - 022。两文内容稍有出入，标题亦不相同。
- [44] 西北作战，耗费巨大，连左宗棠也认识到该役必定成为“销金锅子”，遑论新疆这样幅员广袤的地域，参见《答杨石泉》，《左宗棠全集》第 11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322 页；《答山东臬司陈俊臣廉访》，《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第 307 页。
- [45] 佚名编：《各省奏报军需银两数目》，收入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 64 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年，第 284 页。
- [46] 在京师，内务府不断侵占户部用款，内廷支出成为国家用财的大项。管理户部大臣倭仁鉴于部库空虚，对内务府覬覦部款的倾向十分不满，内务府每年耗费高达 130 万两之多，屡屡向部库透支，倭仁不断提醒其注意撙节财用；户部尚书董恂时时陈诉部库空虚，并极力摆脱内务府屡次向户部亟求工程银两的企图，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京师库储脆弱不支的局面。分别参见《致翁同爵函》，《翁同龢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09 页；《王文韶日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32 - 33 页；董恂著：《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 282 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第 139、158 页。
- [47] 《户部谨奏为西路军饷浩繁中外交困急须统筹全局以规久远而固国本折》，《户部奏折》（乙未冬），收入《阎敬铭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甲 246，第 2 - 27 页。
- [48] 《答陕抚谭文卿中丞》，《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461 页。“某公”指的是丁日昌，而“当事”则系李鸿章。
- [49] 《答杨石泉》，《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505 页。
- [50] 《与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513 页。
- [51] 《答吴桐云观察》，《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513 - 514 页。
- [52] 《答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517 - 518 页。
- [53] 《与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 1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50 页。
- [54] 诸如朱至刚：《试论“文人论政”的流变——以报人的自我期许为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 年第 3 期；付登舟：《胡石庵与辛亥革命前后舆论动员》，《湖北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张军：《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裂变》，《求索》2009 年第 2 期；刘椿：《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论政实践》，《深圳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卢宁：《早期〈申报〉的政治参与与查禁风波》，《福州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等。
- [55] 《论喀什兵寇甘肃事》，《申报》1876 年 5 月 18 日，第 1 版。
- [56] 《辨字林新报所言喀什兵入关事》，《申报》1876 年 5 月 2 日，第 1 版。

Macao residents construct their attitude toward “mainland visitor waves” with identical symbols and interpreting frames. After analyz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elephone interviews of a random sample of 508 residents, researchers found: (1) Education and existing values of an individual relates significantly with his/her identification of symbols that applied on mainland visitors. (2) With other inferential variables, the nature of symbol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interpreting frames on the issue. (3) Both symbols and the extreme negative interpreting frame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ttitudes toward the issue.

#### 51 The Media Intervened Politics: ‘ShenBao’ and Government’s Loan for the Western Expedition during Tongzhi and Guangxu Period

---

· *Liu Zenghe*

In the early Guangxu period, Zuo Zongtang led the main strength of Xiang army against the rebellion in Xinjiang. Around this time, in order to protect English interests in Far East,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frequently tried to protect the existence of Ya‘qūb Beg Regime. For this purpose, English media in China published articles to oppose Zuo Zongtang’s Western expedition constantly. They not only appealed to preserve the Ya‘qūb Beg Regime, but also intervened the borrowing action for Western Expedition. ‘ShenBao’, the famous Chinese newspapers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British, followed the steps closely. This paper played the subsidiary role in these affairs by running editorials or reprinting the other English editorial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henBao’ at this time, attempted an ineffective solution if just depending on self-analysis while neglecting a variety of contain powers inside. As so called “Civilian discussing politics” and “No party, no privately”, would fell into the Rashomon trap unavoidably.

#### 69 Job Income and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of Journalis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A Study of the 1930s

---

· *Tian Zhongchu, Liu Shaow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China, journalists as a social group and a free-lance profession thrived and started its early stag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 this process, job income was an incentive and catalyst for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job income of 1930s journalists, compares their general income with that of other professional groups, analyzes their daily consumption status, and concludes that due to low wages, journalists were in a plight where there was a huge gap between their social prestige and job income, which became a hindrance for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